

第六章 朝鮮战争的準備与日本

第一節 朝鮮战争的迫近与日本的基地化

一 解散旅日朝鮮人联盟

一九四九年九月八日，日本政府在三鷹事件和松川事件之後，突然藉違反“团体等規正令”第二條——主張以反抗或以暴力主義对待佔領軍的团体——的罪名，以暴力解散了“旅日朝鮮人联盟”（简称“朝联”）和“旅日朝鮮民主青年同盟”，沒收了他們的財產，並褫奪了全体幹部的公職。但是，日本政府並沒有指出这些团体行使暴力或反抗佔領軍的任何確鑿的証據。这件事本身有兩種劃時期的意義。首先，这是第一次適用“团体等規正令”，它意味着日本進一步的法西斯化。日本統治集团煽動日本落後羣衆的民族偏見，利用这个弱點使他們相信“朝联”是行使暴力主義的团体，並企圖以对“朝联”使用“团体等規正令”來使人民習慣於今後法西斯暴力的鎮压。法西斯主義已從对個人的迫害和对個別行動的鎮压發展到解散組織和禁止其恢復的階段。

第二，这次事件暗示了美國及从屬於它的日本統治者在亞洲政策上的新發展——進行準備在九個月後所爆發的“熱战”。

二 单独“媾和”与日本加緊軍事基地化

与解散“朝联”同時，美國正迅速地進行着对日单独“媾和”、重新武裝日本和變日本為美軍軍事基地的政策。一九四九年九

月十二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和英國外交大臣貝文在華盛頓舉行會談，九月十七日美英兩國發表關於強制實行單獨對日媾和的方針，聲稱兩國關於迅速召開對日和會問題已取得一致意見，即使沒有蘇聯的參加也是要加以進行的。同年十一月四日美聯社馬尼拉電訊：據駐日美軍總司令部高級官員的意見，美國擬對蘇聯僅做形式上的邀請，將於一九五〇年初在東京由麥克阿瑟主持召開對日和會，並可能在這時締結美日軍事“防禦”協定。翌日，來自華盛頓的消息稱：美國已大体上擬就了對日和約草案，草案中規定美日之間締結軍事協定，媾和後美軍仍駐在日本，保有基地，負責“保障”日本的“安全”，會議也邀請蘇聯參加，但沒有否決權。根據這些消息，我們可以判斷舊金山“和會”的作法以及兩個條約[⊙]的基本內容在此時即已確定了。

早在一九四七年春，對日媾和問題即已在聯合國會員國之間被着重提出來了，蘇聯主張忠實遵守波茨坦公告，根據中、蘇、美、英四大國一致的原則，應由四大國外長會議起草條約草案。美國則一開始就企圖單獨媾和，藉“媾和”之名繼續變相地佔領日本，並置波茨坦公告於不顧，主張由遠東委員會用多數表決的方法來起草和約。由於蘇、美兩國意見不同，至同年秋天，對日媾和問題暫時擱淺，自此以後，美國就一直推行着“事實上的單獨媾和”政策。

一九四八年秋，蔣介石政權在中國的徹底失敗愈益明顯，美國就開始更加注目日本了。同年十二月十四日，“紐約時報”軍事評論家漢森·鮑德溫論稱：“如果對美國在東方的戰略地位加以重新檢討的話，那末遲早要歸結到利用日本人力資源的問題。因此必須修改放棄武裝與戰爭的日本憲法”。同日，英國“每日郵報”駐紐約特派記者報道稱：“爲了對抗中共軍的勝利，美國的

⊙ 指舊金山對日單獨“和約”及美日安全條約。——譯者

戰略家和軍事部門正在研究日本的重新武裝和利用日本人力資源的問題”(“朝日新聞”)。翌日,美國駐日本佔領軍主力部隊第八軍前任司令艾契柏克中將發表主張說,在日本建立一支以小型武器武裝起來的、以十五萬人為限的“警察部隊”是当前的急務,而“美國政府高級官員”和“國防部消息靈通方面”也提出了同樣的主張(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五日“讀賣新聞”、十二月二日“朝日新聞”)。這些雖然是含糊的新聞報道,但正是一年半之後出現的“警察後備隊”計劃的最初表現。

但是,當時美國的軍方、政府和一些戰略家之間,關於日本的利用價值和利用的方法,從世界戰略的觀點來看,有某些分歧意見。麥克阿瑟一派主張,因為失掉了中國大陸,所以必須在日本和沖繩建立強有力的軍事力量,以此為進攻大陸的基地;而國務院方面則從歐洲第一主義出發,覺得日本的戰略價值不大(一九四九年一月三日“生活”雜誌)。因為有這種分歧,一九四九年二月,美陸軍部長羅雅爾到了日本,對日本和南朝鮮進行視察,並明確地拒絕了麥克阿瑟增強駐日兵力的要求。不僅如此,他還曾對新聞記者說:“(一)一旦發生戰事,日本不但不能有利於美國,反而會成為美國的負擔;(二)亞洲的戰略價值次於歐洲;(三)美國為了自己的利益,在必要的時候,有權利從日本撤兵”(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九日)。這使得一心依靠美國的日本統治階級非常狼狽。但這件事情從另一面來說,則是美國在可以利用日本的時候將盡量予以利用。

關於如何利用日本這一點,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等認為結束佔領形式早日“媾和”更為有利,而美國國防部却堅決主張繼續佔領。一九四九年六月,蘇聯提議為根據波茨坦公告進行全面對日媾和,應迅速召開中、蘇、美、英四國代表會議。美國害怕蘇聯取得了對日媾和的主動權,同時又因中國形勢的發展對美國絕對不利以及它已經把發動朝鮮戰爭的準備提到了日程表上,

所以在九月間召開了上述的艾奇遜、貝文會談，決定採取排斥蘇聯的对日“媾和”和美軍在日本保有基地的方針。但國防部仍主張繼續佔領，以便隨心所欲，不受任何限制。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一日，美陸軍參謀總長柯林斯到日本，在東京發表聲明稱：“佔領軍已成為安定遠東的力量，因此要根據需要而繼續駐軍”。接着在年底，美陸軍部次長伍立茲與參謀本部作戰部長偕同來日，與麥克阿瑟進行了某些協商，並曾與吉田首相會晤。伍立茲曾發表談話說，在他與麥克阿瑟的協議中“也包括為美國陸空軍建立設施而利用日本及沖繩勞動力的可能性的問題，得到的結論是：新工程的百分之七十五可依靠日本的勞動力來解決”（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一日“朝日新聞”）。

在進入一九五〇年以後，日本走向美國軍事基地化的速度日益加緊了。麥克阿瑟在新年文告中威嚇日本人說，人民中國的成立給日本帶來了威脅，他還滑稽地強調日本憲法中的關於放棄軍備的規定，絲毫不否定日本有“防禦”外來攻擊的自衛權利。美軍總司令部民政局長惠特尼對上述文告進行解釋說，麥克阿瑟的文告並不意味着日本有重新武裝的權利，但是它意味着日本有與“外國”——實際上是美國——締結“防衛”同盟或進行交涉、接受“聯合國的保護”的權利，日本如果沒有這種“同盟”或“保護”就不能對抗外來的攻擊；這事實上是後來締結“美日安全條約”和日本“協助聯合國”計劃的暗示。

與上述論調相呼應，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吉田首相在日本議會上強調了不放棄自衛的權利。法西斯主義者確實是善於饒舌而健忘的。僅在三年半以前，吉田尚以首相身份在國會上饒舌稱：“很顯然的，近年來的戰爭大都是以行使國家防衛權之名而進行的，因此承認防衛權，往往成為引起戰爭的原因”，“我認為承認因行使國家的正當防衛權而進行的戰爭為合理乃是有害的事”。

在美國的心目中，對日媾和問題，首先只是美國在遠東的戰略問題，只是利用日本的國土、資源與人力為美國的戰爭目的提供便利的問題，它從未从日本的獨立或履行國際正義的問題上加以考慮過，這一點已至為清楚地說明了單獨“媾和”的本質。儘管國務院反對軍部的意見，主張結束佔領形式，但一九五〇年一月十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上院却聲言：“日本為亞洲的防共鐵壁，必須在整個遠東地區重新確立它的影響力量”，兩天之後，他又強調美國要在日本、阿留申羣島和琉球保持堅固的軍事基地，對促進日本的完全獨立或保障日本的安全等却一字未提。同月十五日合衆社的電報盛讚橫須賀已成為美國的永久軍事基地，同月十八日美聯社東京分局局長羅素·布蘭斯稱：“現在美國的主要基地，計有橫須賀海軍基地及分佈在全國戰略地點的至少八個航空基地”，並稱：“从北海道到九州建設有許多飛機場，這些機場的跑道可供最大型的轟炸機降落之用”（一月十八日“日本時報”）。

同一時期，美陸軍參謀總長柯林斯曾在美國國會上作証說：“駐在日本和歐洲的美國陸軍，在數月以內要進行一旦遭到敵人攻擊時能很好的完成其任務的準備”，並稱：“陸軍提出了四十億二千萬美元的預算，這是維持十個師團所需的費用，其中有四個師團將派駐日本”（二月十五日公佈）。美國將現役陸軍的百分之四十派駐在日本，並且要在“數月以內”，即到六月間要完成戰鬥準備，凡是有良知的人看到這個報道都忧心這不是一件普通的事情。果然，朝鮮戰爭於六月爆發了，駐日美軍立刻就出動到前線去了。一九五〇年一月底柯林斯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萊德雷、海軍作戰部長薛爾曼、空軍參謀總長范登堡等偕同來東京，他們逗留到二月六日，與麥克阿瑟進行會談並視察各地。我們雖無法知道他們商議和研究了些甚麼，但是我們可以相信這與前述柯林斯在國會的証言、美國與李承晚的軍事協定以及日

本基地的擴充和修建等都是互相有關聯的。

在這期間，日本國民反對日本軍事基地化和反對單獨媾和的鬥爭日益高漲，特別在一九五〇年一月九日共產黨情報局機關報批判了日本共產黨的野坂理論以後，激起了全日本國民深刻的民族自覺，使民族鬥爭有了迅速的發展（後面還要詳細談到）。此外，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締結，給了日本國民以很大的感動。這些情況促使美國的統治階級大多趨向於下列見解，即他們認為對日本採取“媾和”的形式，反而有利於對日本的實際佔領與統治，佔領形式的繼續，只有刺激民族鬥爭而沒有好處。結果，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四日，反對“媾和”的急先鋒陸軍部次長伍立茲不得不辭職，繼而陸軍部長格雷也辭職了。四月六日共和黨領袖杜勒斯——摩根財閥的律師、有名的最頑固的反蘇反共分子——就任為民主黨杜魯門總統的國務院顧問。中國人民解放軍迅速地取得海南島渡海作戰的勝利之後，使美國的統治者深為憂慮；加之在朝鮮要求和平統一南北朝鮮的人民力量的發展，情況“已不符合於美國的時間表”了。因此杜勒斯發表了“積極促進對日媾和”的聲明（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四日），繼而他被任命為主要負責進行對日“媾和”的工作（同年五月十八日）。

在此十日以前，吉田首相曾說過：“與美國等國家的單獨媾和，事實上已經完成了”。又說：“日本是佔領基地，但不是軍事基地”。反過來說，也就是吉田親自承認了“與美國等的媾和，就是事實上的長期佔領；日本向美國提供的軍事基地也就是美軍佔領日本的基地”。當時美國政府的喉舌“紐約時報”曾論稱：“美國可以締結一個包括在日本保持一連串軍事基地條款的和約，但這並不是僅保持個別空軍基地，而必須是在軍事上和經濟上將日本全國變為美國的基地。”該文說：因此，即使在形式上結束軍事佔領，也要考慮辦法，使日本全國在軍事上和經濟上實際是

處於美國統治之下，“杜勒斯的困難就在這裏”。這樣的對日“媾和”當然“必須排除蘇聯和共產黨中國來進行”，“朝鮮的形勢使處在危險地位的日本受到威脅，日本人從丰臣秀吉時代^①起就把朝鮮稱做是指向日本的短劍。在蘇聯控制北朝鮮時，如果美軍突然撤退，自由的韓國就將崩潰，這柄短劍則將再度（！）握於蘇聯的手中”。於是這柄短劍就勢必指向非武裝的日本，所以美國必須“保衛”日本，“必須在軍事上和經濟上將日本全國變為基地”。

無論是丰臣秀吉時代或它以前及以後的時代，朝鮮從未成為指向日本的短劍。朝鮮在古時是日本文化的老師。歷史說明，早自古代日本天皇制成立之時開始，當日本的專制統治者們，自認為有力量的時候，就企圖侵略朝鮮，而且自丰臣秀吉時代起以迄於最近，朝鮮經常成為日本的專制統治者侵略大陸的跳板。這些事實，無論美國新聞記者如何無知也是應該知道的。無論如何，他們這樣地偽造歷史，把美國的对日單獨“媾和”——露骨地要求變日本為美國軍事上和經濟上的基地——與虛構北朝鮮有侵略南朝鮮的危險連結在一起，這與一個月以後發生的情況結合起來看，實在是意味深長的。

第二節 財政經濟上的備戰

一 財政和工業

朝鮮並不是共產主義指向日本的短劍，相反地，為了使日本成為帝國主義指向朝鮮、全亞洲以及蘇聯的短劍——如“紐約時報”公開講過的，成為美國軍事上和經濟上的基地——日本的國

^① 丰臣秀吉（一五三六——一五九八年）一五九一年曾經統一全日本，主張侵略朝鮮，一五九二年及一五九七年兩度向朝鮮出兵，結果敗退。——譯者

家財政也被賦予了這種主要的任務。為此，一九四九年底，道奇又與美國陸海空三軍最高首腦先後來到日本。道奇編製了日本一九四九年度的補充預算和一九五〇年度的預算案，並強迫日本政府和國會加以接受。我們在前面（第五章）已經敘述過道奇預算的基本性質——使日本財政、金融和經濟為壟斷資本利益服務並使之從屬於美國的軍事性和殖民地性——而一九五〇年度預算案把這個基本性質更加明顯地暴露出來了。

在預算總額中，一般會計項下較上年度減少了百分之十強，在特別會計項下減少了百分之二十六強。它們聲稱“這是昭和以來第一次的劃時期的走向緊縮財政的轉折點”，並高唱“通貨收縮”的效果。但是在這個緊縮的預算中，“對日援助對等資金”卻從一九四九年度的一千五百零八億日元增加到一千五百八十一億日元。這項金額相當於同年度產業設備資金的百分之八十八，也就是說日本不能自主運用的“對等資金”控制了主要的日本產業和金融。並且將這項資金的投資，預定投入以國營電氣通信事業、國營鐵道和國營林業為主的公營企業四百億日元，以電力、船舶為主的企業以及其他金融機關、煤炭和鋼鐵等巨大壟斷資本的私營企業約四百億日元，償還債務五百億日元。如前所述，日本軍事基地化是美國對日的基本政策，不用說所有這些投資都是有它的軍事目的的。

一九五〇年度歲出預算緊縮的主要因素，是該年預算中的價格補助金減至九百億日元，幾乎比上年度減少了百分之五十。削減價格補助金的目的是在於通過外匯預算使日本對外貿易服從於美國的利益，同時使日本物價“接近”國際價格，從價格方面使日本產業從屬於美國壟斷資本。這並不意味着削弱了對日本壟斷資本的權力的保護，而是意味着壟斷資本對工人和中小資本家剝削的酷烈。回想起麥克阿瑟指令實行九原則的時候，他曾經說九原則要求日本人更須勒緊腰帶，“要求暫時放棄給予自由

社會的一部分特權和自由”。在這個政策下，陸續出現了以紡織、人造絲工業為首的中小企業的倒閉，有的人因繳不了稅金或還不了債而自殺了。但是大藏大臣池田在一九五〇年三月一日會見記者時却傲慢地說：“在大的政策面前，多多少少的犧牲是難免的，即使有五、六個人的自殺也是算不了什麼，大家用不着吵吵嚷嚷”。恰巧就在同一天，在盟國對日委員會上英聯邦代表也指出了“日本產業、經濟和金融的百分之八十已為舊財閥系統的八大銀行所控制”。

在一九五〇年度預算的歲出裏，直接與以後的朝鮮戰爭有關而特別具有深刻意義的，是在一般會計項下編列了七百二十三億日元的國債償還費。這項金額等於一九四九年度的二倍，一九五一年度的三倍以上。一般的說，國債償還問題是道奇預算的基本方針之一。它的目的在於：首先是有利於國內債權者即國內壟斷資本家，其次是以償還外債的方式為導入外資鋪平道路。然而偏偏在一九五〇年度預算編列如此空前的巨額——本年已到期應償還的國債僅為八億三千万日元——這是意味著什麼呢？道奇離日本半年之後，朝鮮戰爭一爆發，麥克阿瑟就命令日本政府建立警察後備隊，並指定從國債償還費裏支出二百億日元作為它的創辦費。無疑地，在這個異常龐大的國債償還費中事實上早已隱藏着直接的軍事費了。

美國不僅通過道奇預算或貿易管理使日本產業軍事化並從屬於美國，而且在一九四九年秋至一九五〇年這一期間美國採取了更直接的形式來加速推行這種政策。日本石油、帝國石油和東亞燃料以及其他幾家日本公司壟斷了最重要的軍需品的石油等——採掘原油和輸入原油的精煉——而這些公司由於“導入外資”，已為德士古、美孚和其他美國石油資本所控制。一九五〇年二月十五日共產黨議員川上貫一在國會指出最近期間不斷大量輸入和儲藏與日本民需毫無相干的石油的事實，並質問

爲什麼要輸入和儲藏石油，輸入石油的所有權究竟屬於日本人還是外國人，而政府對此未能提出任何答覆。

重工業、化學工業的大企業相繼生產美軍軍用品並成爲美軍直接管理的 P D 工廠（特需工廠），有的雖還未成爲美軍直接管理的工廠，但也已開始了各種的軍需生產或是準備走向這個方向。東日本重工業（舊三菱重工業）的下丸子工廠、富士汽車工廠（舊日軍直轄工廠）和小松製作所相模原工廠（舊日本陸軍兵工廠）等早已爲美軍生產吉普車、卡車等以及修理和裝配各種汽車、戰車和壓路機等。過去屬於日本陸軍兵工廠的赤羽兵工廠改名爲日本製鋼赤羽工廠，廠內劃分爲三個地區，第一地區修理和改造步槍或小型武器零件，第二地區製造戰車零件，第三地區修理七五公厘及一〇五公厘大砲等重兵器和製造高射砲用的卡車零件。日本特殊鋼、五十鈴、日產、豐田和池貝等大汽車製造工廠也全部或局部變爲美軍直接管理的工廠。有些民需產業工廠已由生產卡車轉爲製造登陸艇了，日本製鋼武藏野製作所由生產農業機械轉爲生產登陸艇了，石川島造船工廠的第二工廠也開始登陸艇的製造。日本最大規模的染料工廠三池染料大牟田工廠由減少或停止原來的醫藥品、染料的生產，改爲生產猛烈炸藥 TNT 原料的硝基甲苯及航空用燃料的汽油等，而且還生產苛性鉀等染料的半製品，這隨時都可以改爲生產可怕的毒瓦斯。保土谷化學王子工廠開始生產可以轉換爲生產炸藥的硝基氯苯和硝基苯，獅子油脂公司的平井工廠、三井化學名古屋工廠、大日本賽璐珞堺工廠、日本觸媒化學公司、日本水泥公司以及其他化學工業的大企業也都開始轉入軍需生產（“產業勞動調查月報”，一九五〇年七月號）。

一般人想像不到的工業部門也開始製造軍需品了。例如日本紙業公司龜有工廠把紙製品的百分之四十轉爲火藥箱的生產了（同上）。一九五〇年三月我曾經到長野縣伊那去旅行過，所

說那裏的小規模的製木工廠，只有製造彈藥箱、製造包裝砲身的木筒或其他材料的工廠才因加班、加夜班而出現着景氣，一般民需生產則蕭條得很。

二 農業和農民的生活

日本農業對美國的從屬性被加深了。儘管美國佔領軍當局和日本政府採取了反農民的政策，但由於農民的努力，一九四九年日本農業生產大體已恢復了原狀。然而，日本政府不是進一步地設法增加國內糧食的生產，而是盲目服從美國佔領政策的要求，從外國輸入了超過需要量的大批糧食。在一九四九年一月至十二月之間，日本輸入了二百九十萬噸糧食，比日本政府向佔領軍請求輸入的數量還多出六十一萬噸，這與其說是輸入糧食不如說是輸入美國的農業恐慌。一九五〇年的輸入數量是更加增大了，自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起至一九五〇年六月止共達一百六十萬噸，這些進口糧食的價格，大米每日石為九千六百七十一日元至一萬零七百二十日元，而日本政府向農民強制徵購大米的價格每日石為四千二百五十日元，尚不足輸入大米價格的二分之一！如果將這筆被外國農業資本家和商人賺去的錢，用於本國的農民和農業，對於農民和全國人民將會有什麼樣的幫助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吉田政府一方面百依百順地執行佔領軍的這種政策，一方面向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召開的第六屆臨時國會提出了部分修改“確保糧食臨時措施法”的法案——即強迫追加徵購糧食法、簡稱為“食確法”——遭到了全國農民的猛烈的反對。該法案在眾議院因自由黨佔絕對多數獲得了通過，在參議院的情況則不是那樣的。美國佔領軍對參議院施用了壓力，吉田首相並提出了參議院如果不通過這個法案就是違反佔領政策。結果參議院還是以未審核完畢為名壓下了這個法案。臨時國會於一九四九年

十二月三日結束，次日召開了第七屆國會。儘管在國會開會期間，日本政府還是按照美國佔領軍的指示，在十二月七日以“波茨坦政令”強制施行了“確保糧食臨時措施法”。所謂國會只能按照美軍和日本政府的意志行事，如果違背了它們的意志，那末國會就要遭到上面所說那樣的壓力。並且當時的糧食情況，並沒有緊迫到足以構成藉口來這樣公然地蹂躪民主、必須製訂強迫向農民追加徵糧法案的程度。但儘管如此，它們之所以還要強制施行這項法案的原因，大概是出於這種陰謀，即它們企圖在糧食情況比較好的時期做好法律上的準備，以便一旦發生戰爭等情況對糧食有所需要的時候，隨時可以由美國任意榨取日本農民。

在這種殖民地化的農業政策之下，日本農村呻吟於日益加深的恐慌中。由於實行了道奇政策，使得都市人民更加貧困，降低了对農產品的購買力，青菜、水果等非統制物資領先，農產品的價格暴跌了，大米的黑市價格跌到前一年的二分之一以下。一九五〇年四月東京每日升大米的價格由前一年的二百四十日元跌到一百零七日元。大米出產地的黑市價格比公定價格還要低。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政府接到了美軍總司令部天然資源局的“授意”——等於命令——於三月七日決定：（一）本年度大米在徵購後允許自由販賣；（二）早收米的獎勵金及超額徵購的特別價格，由現行的生產者價格的兩倍減為一點五倍；（三）自一九五一年四月起全面取消對主食品的管制制度。

這個政策看起來似乎與僅在四個月前才施行的極端反民主的“食確法”相反，但表面上儘管相反，本質上却是相同的。因為：第一，它使支持自由黨的農村惡霸——地主、富農、農村商業資本家（二者往往合而為一）可以在秋收時殺價收購貧農的大米，自己囤積起來，待大米漲價時賣出謀利，同時也增大了他們以高利貸榨取不得不出賣自用糧的貧農的可能性；第二，它為美

國擴大控制日本農業的道路，因為在帝國主義、反動政府和農村惡霸統治下的農業生產關係是不能滿足糧食的絕對需要量的，是或多或少地需要輸入的。在這種條件下，允許國內自由販賣主食品，可以通過美日兩國政府的關係，便於美國統治者操縱進口糧食，掌握日本糧食的命脈，並可使農村惡霸從中牟利。這對苦於糧食徵購制和糧食統制的農民以及消費者雙方來說，只是以准許“自由”買賣的美名，把萬事推給經濟法則。正如大藏大臣池田恬不知恥地狡辯的那樣：“富人可以吃米，窮人（當然包括農民在內）只好吃麥”，這真是帝國主義的最惡劣的反人民的政策（朝鮮戰爭爆發後，使它們必須估計到戰時糧食的自給問題，因此這個做法已行不通。但儘管如此，美軍總司令部和日本政府為了必須供應朝鮮，還是採取了與徵購相同的辦法，“追加”了一九五〇年產麥徵購的比例。總之，不管是緩和徵購或是加強徵購，在這些內外統治者的心目中是沒有日本農民和日本人民大眾的）。

日本政府曾不斷企圖推翻“土地改革”。一九四九年四月以來製訂了提高佃租的法案，它不顧遠東委員會（五月八日）指令美軍總司令部必須繼續遵守土地改革的原則的指示，同年十二月又製訂了將佃租和土地價格提高七倍的法案。在遠東委員會指令的面前及由於日本農民的反對，一九四九年實行這個法案時，不得不將該年度佃租的提高率比預定的多少予以降低了。但在一九五〇年八月終於實施了將佃租提高了七倍的原來的方案。佃租與土地價格的暴漲是違背“土地改革”的精神的。然而，日本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十月又進一步地製訂了包括以下各項內容的法案：即停止強制收買土地；廢除用以保障耕作權的恢復佃耕權的規定；凡被政府收買的土地或未開墾的土地，如認為適合於建築住宅或作非農業用途時，可以把它歸還原地主等。

這類法案不僅停止了“土地改革”，而且替地主打開了收回

土地的道路，使農民的耕作權極度不穩，因此是露骨的反動法案。連麥克阿瑟也認為當時強制實行這種法案反而不利，因而沒有加以支持。日本政府雖暫時擱置了這類法案，但仍繼續製訂了代替的方案，如（一）對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以後新成為離村地主的佃出土地和佃出牧畜地，不再強制收買其超過法定限制面積的部分；（二）對十二月二日以後新發生的不適合耕作業務者超過法定面積的自耕地不指定收買等。總之，這些都是使農村惡霸今後能自由變為離村地主或地主的法律。這些法案得到麥克阿瑟的支持而提到日本第七屆國會，由於農民團體的猛烈反對未獲通過，在第八屆國會上也是以未審查完畢被擱置起來了。

一九五〇年九月——朝鮮戰爭爆發後——日本政府頒布了“波茨坦政令”，其中規定：（一）一九五〇年七月三十日以前應由政府收買的土地和牧畜地仍按原價收買；（二）一九五〇年七月三十一日以後新成為離村地主者所有之出租土地或出租牧畜地，以及超過法定限制面積的在村地主的出租土地或出租牧畜地，應強制轉讓出售；（三）土地價格最低為現行價格的七倍左右，佃租亦提高七倍。強制轉讓的手續是：（一）公佈應轉讓的土地；（二）土地所有者選定和呈報願承受者的姓名；（三）市町村農地委員會製訂轉讓計劃；（四）縣長批准；（五）發給轉讓證書。如果土地所有者未呈報願承受者，可由政府接受轉讓。這個政令與以前的法案相比較，對地主雖多少有所不便，但它實際上是使他們可以自由決定土地價格，只對土地的轉移加以管制。況且這個政令是由地主惡霸控制的地方政府機關來執行的，既然沒有農民的監視與鬥爭，“強制轉讓”的強制力量即等於零，反而給有錢人開闢了可以大搖大擺集中土地的道路。事實上在農村中已經發生了“曲解”（？），認為這個政令是使地主可以自由收回土地（見後）。

這些反動法案是否會廣泛地使寄生地主復活和成長，關鍵在於農民的經濟情況和鬥爭力量。但是這種千方百計企圖強制實行反動法案事情的本身，已經與土地價格和佃租的上漲以及地主執行徵購制度等相配合，鼓勵地主和農村惡霸奪取土地，給它們以重溫舊夢的希望，增加了他們在農村的政治和社會勢力。這是企圖使耕作權不穩定，從而加深農民對地主和農村惡霸的隸屬地位。⁵⁶吉田內閣及其主子就是這樣竭力企圖在日本農村中鞏固和培養作為它們的支柱和爪牙的階層。

都市產業部門的加緊解僱和中小企業的破產，使農村的失業和半失業者大量增加了。連日本政府的“勞動力調查”也承認一九五〇年二月在從事農林業勞動者中，每週僅工作三、四小時以下的達七百五十五萬人，較頭年同時期增加了一百九十四萬人，佔從事農林業勞動者總數的百分之五十，即使在農忙期的六月，一九五〇年也較頭年同時期增加了一百萬人。這對農民的解放和生活的提高給予了怎樣程度的壓迫是不可估計的。民法即使有所修改，但事實上根深蒂固地殘留着的封建家族制度，却掩蔽了這種龐大的農村失業者 and 半失業者，而這種狀態又反過來維持着封建的家族制度。同時它又給工人的低工資提供了條件，那是更不用說的了。

關於低米價的強制徵購和稅金的重担，沒有一一列舉數字的必要。例如迄至一九四九年為止所徵收的地租，從一九五〇年起改為徵收“固定資產稅”，一舉而增為從前的三倍半。這就勢必使居民稅和其他地方稅也提高一倍。⁵⁷由於佃租和土地價格的上漲，使得農民僅有的一點改善生活的可能性也被剝奪了。

所有這些情況，都使整個日本農業日益走向破壞的道路，各地都發生了農民放棄耕地的事件。根據一九五〇年二月的農業調查，與頭年三月比較，農家總戶數約從六百二十五萬戶減為六百一十七萬戶。也就是說戰後有增加趨勢的農家戶數反而變為

減少了。並且這些農戶的百分之五十是兼業農戶（與一九四七年八月的調查比較，在比例上增加百分之五點四，實際數字增加四十六萬戶）。兼業農戶中以農業為副業的第二種兼業農戶的增加尤為顯著，佔全體農戶的百分之二十二，共一百三十四萬七千戶（比一九四七年增加百分之五點九，實際數字增加三十八萬戶）。並且這第二種兼業農戶的百分之八十是經營不滿五反土地的農戶，也就是說，這些農戶是將要从農業中被全面地驅逐出來的半無產階級；實際上，他們中不少人已被剝奪了農業經營者的地位。一九五〇年度經營不滿三反土地的農戶比一九四九年度的調查數字在比例上和實際數字上都減少了（附表見第二一九頁）。

從日本政府的統計上可以看出來，戰後日本農業分化的新趨勢是，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〇年時，最下層的農戶終於被迫全部地或部分地離開了農業，而中農階層則有所增加。這並不表示中農經營的穩固，只不過說明了整個日本農業在殖民地重壓之下，逐漸走向破產，中農吸收了貧農放棄的土地，拚命地設法以圖生存。實際上，根據農林省農戶經濟調查——以中農階層為對象——一九四九年包括農業以外的收支在內的現款總收付中，就有三千五百日元的虧空。一九五〇年由於朝鮮戰爭爆發後所產生的“繁榮”，上述農林省的調查宣傳說這項數字有了一萬七千日元的盈餘。即使如此，這也是由於：第一、農業以外的收入，特別是出賣勞動力的增加；第二、農民的經營費的縮減，特別是家庭生活費縮減的緣故。因此，這反而表示農業經營本身虧耗的增大和農業正在走向破產的道路。中農尚且如此，中農以下的農民則不是所謂盈虧的問題，而只是能否活下去的問題了。

這就是在日本走向殖民地化、軍事基地化的過程中，國內外壟斷資本以及與它相勾結，受它所培養、鼓勵和鞏固的地主、惡

需对農民的統治和榨取在“土地改革”後帶給農民的結果。

按經營面積分類的農戶構成變動表(1947—1950年)

	農戶總數	3 未	反 滿	3—5 反	5反—11— 町	1.5— 1.5町	1.5— 2町	2町— 3町	3町 以上	不耕作 農戶
	千戶	%	%	%	%	%	%	%	%	%
全	1947年 8月1日	5,909 (100%)	23.9	17.5	31.0	15.7	6.2	3.6	2.1	0.0
	1949年 3月1日	6,247 (100%)	25.8	17.2	31.1	20.8		3.2	1.9	0.0
	1950年 2月1日	6,176 (100%)	23.8	17.0	32.0	15.6	6.1	3.4	1.9	0.1
國	實 數	千戶 (1,472)	1,051	1,973	961	379	208	131	8	
全國(北海道除外)	1947年 8月1日	5,703	24.5	17.9	31.8	16.0	6.1	3.2	0.5	0.0
	1949年 3月1日	6,013	26.7	17.0	32.0	15.2	5.8	2.8	0.45	0.05
	1950年 2月1日	5,931	24.1	17.4	32.9	15.9	6.1	3.0	0.5	0.1

每町約等於九九·一八公畝(約等於我國14.88市畝)

第三節 反对軍事基地和爭取全面 媾和的鬥爭

一 勞工組織的分裂

逐漸使朝鮮的天空慘淡無光的備戰活動，不僅加速了日本變為美軍的軍事基地和日本產業軍事化的過程，把日本工人置於美軍的槍砲威脅下，而且使得对人民的法西斯鎮壓和分裂羣衆組織的工作，自一九四九年夏、秋以來也更加緊了。前面所述的解散“朝联”便是它的第一砲，對於具有戰鬥性的工会會員則變不講理地實行解僱。另一方面，在資本家、政府和美軍總司令

部的積極的保護和鼓勵下，照例以所謂“工会民主化”、“保衛工会免受共產党的控制”的藉口，使工会在戰後遭到最嚴重的分裂。一九四六年以來成爲日本工人運動主力軍的全國官公廳工会聯絡協議会受到了很多次接連不斷的鎮壓和分裂的毒手。左右兩派對立得非常尖銳的國營鐵道工会，自一九四九年夏天遭到“蔭肅赤色分子”以來，一時處於右翼社會民主主義和法西斯分子的控制之下。全官公廳工会聯絡協議会組織中最強有力的統一組織“全遞信工会”也出現了分裂派，一九四九年十月他們組織了全遞信從業員工会，从而使光榮的全遞信工会遭到了分裂。全國自治团体工会協議会（簡稱“自治勞協”）亦於十一月自日本自治团体工会總联合会中分裂出來。這些分裂出來的新工会，與日本教職員工会（九月脫離“全官公”及“全勞聯”）一起，於年底組織了日本官公廳工会協議会（簡稱“官公勞”）而與“全官公”對立了起來。私營企業方面，作爲各企業工会聯合體的，顯示過鬥爭力量的全日本產業別工会會議以及屬於它的各產業工会也早已有“民主化同盟”的組織，這些組織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正式組成了全國產業別工会联合会（簡稱“新產別”）。在私營單一工会中規模最大又是強有力的工会之一的日“電產”自十一月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開以後也爲民主化同盟派所控制終於脫離了“全勞聯”。這樣，過去在全國產業範圍內組織了數百萬工人的全日本產業別工会會議現在縮小成爲以全國金屬產業工会爲中心的少數工会的聯合體，失去了往年的面貌。

這些日本官公廳工会協議会、全國產業別工会联合会和日本電氣產業工会等工会與全日本煤礦工会联合会（全國煤礦工会的統一組織，爲民主化同盟派所控制）、全日本金屬鑛山工会联合会（一九四九年七月脫離“全勞聯”）、私營鐵道工会總联合会、海員工会等獨立的大工会以及從來就和產業別工会會議相

對抗的聯合組織日本工會總同盟，在美軍總司令部公開與不公開的援助下，以“民主的勞工統一戰綫”為標榜，於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就開始籌劃組織“日本工會總評議會”（簡稱“總評”），一九五〇年三月召開了籌備大會。毫無問題，“總評”原來就是要與“全勞聯”相對抗的組織。從國際方面來說，“全勞聯”是參加了世界工會聯合會的，而“總評”則與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彼此均力圖取得密切聯繫。國營鐵道民主化同盟的負責人加藤閱男得到了美軍總司令部的積極援助，參加了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的籌備會和成立大會。美軍總司令部一方面慫恿日本工會參加了這類會議，但當蘇聯金屬工會邀請日本金屬產業工會赴蘇時，卻堅決禁止其前往。它是不讓人民知道蘇聯的真實情況的！一九五〇年三月召開“總評”籌備大會時，該會接到了美國勞工聯合會、產業工會聯合會、英國職工大會以及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的主席及秘書長的賀電。關於“總評是美軍總司令部的工具”的輿論，美軍總司令部勞動科的布拉蒂居然作這種解釋：“我是不相信這種愚蠢的說法的，但是，假定這是事實，我們以為這是無上光榮。”（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八日在勞工教育研究會上的演講，見“日本勞動年鑑”第二十四集）

在這些分裂工作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全日本海員工會、全日本造船工會和全日本港灣工會的代表自一九五〇年一月九日起至十一日止在千葉縣的鴨川與美軍總司令部勞動科的威廉進行了三天的會談。會談結束後，一月十二日全日本造船工會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從“全勞聯”和“大金屬”組織中退出，接着港灣工會的幹部也相繼悄悄地決定自產業別工會會議退出。朝鮮戰爭爆發後，美軍立即雇用了包括海員在內的約三十萬噸的日本船舶，報紙報道過有關日本人船長參加了美軍浦項登陸作戰（七月十八日）活動的消息（“讀賣新聞”），這些與上述事實不是沒有關聯的。

分裂勞工戰綫的活動，從各個工會起遍及於全世界的範圍。不管分裂的藉口是“工會民主化”還是其他什麼鬼話，工人組織的分裂是大大地削弱了工人的力量，並使佔領當局、資本家和日本政府從心底大為高興。麥克阿瑟在一九五〇年的元旦致詞特別為慶賀分裂的成功讚譽民主化同盟說：“工人也以他的努力和愛國心，對日本的復興作了很好的貢獻。現在他們已脫離了過去的那種不負責任的領導而把舵轉向了正確的方向，正朝着客觀而健全的將來前進”。又說：“工人們一般都是要求穩健的中間道路的”。不幸的是，這些分裂活動和鎮壓不僅削弱了左翼勞力，而且實際上是削弱了整個日本工人階級的力量，從而也使全國人民的力量暫時大為削弱，並使他們不得不後退了一步。

然而，麥克阿瑟大概有些錯覺。這位元帥並不十分了解工會分裂主義幹部與工會會員工人大眾之間的區別。不管幹部怎樣蛻變，羣衆對於為道奇路綫所強制造成的飢餓和失業，不得不挺身起來進行鬥爭，保衛業已被壓到最低限度的生活。工會雖然分裂為兩個，但工人階級的利害是一致的。工人雖然苦於工會的分裂和幹部的對立，但為現實的生活而進行鬥爭這一點是共同的。自從一九四九年進行年終鬥爭以來，“勞動爭議”的浪潮逐漸高漲了。在這個浪潮的推動下，甚至連國營鐵道的星加要這個衆所週知的社會法西斯幹部也不得不參加了絕食罷工。這個罷工與歷年的年終鬥爭有所不同，在年終過去以後，罷工的浪潮依然沒有低落。一九五〇年三月，參加勞動爭議的人數達一百二十萬人，損失了三百八十四萬個勞動日，就勞動日的損失來說，它比過去最高記錄的一九四六年十月的二百四十一萬個勞動日超過了百分之六十。而且，這個鬥爭已由一九四九年的反對降低工資反對解僱的防禦性鬥爭，部分地開始轉為要求提高工資的攻勢鬥爭了。此外，這個打破記錄的勞動爭議的主力軍並不是從前的“國鐵”以及其它的日本官公廳工會協議會，而是

全日本机器工会、全國金屬產業工会、全日本金屬礦山工会联合会、全日本煤礦工会联合会和電氣產業工会等私營基礎產業的工人。工会幹部中即使是与威廉進行了鴨川会談的港灣工会幹部，也反对遲發工資和解僱，並提出了為保證他們地位的統一的“集体合同”要求。一九五〇年二月底港灣工会中的神戶港“塔里曼分会”所進行的罷工是第一砲，接着(大)阪、神(戶)和北海道港灣的工人也同時舉行了罷工。這是他們在日本戰後首次進行的罷工。工会幹部說港灣事業是屬於佔領軍的“公益”事業不得舉行罷工，但工人打破了这种幹部的合法主義而前進了。港灣工人對於職業安定所强迫他們服从帝國主義的港灣行政且為軍事目的服務的措施開始進行反抗了。

儘管羣衆的意志如此高漲，但因為工会幹部是受麥克阿瑟讚揚之類的人，對於三月攻勢只發表了準備總罷工的聲明而未付諸實行，因而也就未能貫徹所提出的要求，至於它的最大收穫則是羣衆已開始對工会幹部的合法主義進行批判。一九五〇年三月七日，日本政府對於當時的“電產爭議”採取了高壓的態度，內閣官房長官增田聲稱：“即使是一個工会的罷工，如果它的影响及於全國，如果它是重要的產業部門，應視為違反禁止總罷工的麥帥命令而加以禁止”。但是，第二天与第三天全日本煤礦工会联合会全國會員有百分之九十三進入了波浪式的罷工，一脚踢開了美軍總司令部布拉蒂和艾米斯的干涉，舉行了三次罷工。羣衆的这种鬥爭力量，使得以金屬工業工人為中心的“全勞聯”系統的工会所領導的大企業部門，走向了長期的大規模的爭議。一九五〇年四月日立製作所工会總联合会二萬一千人提出了提高工資的要求，資本家反而以大批解僱（包括“整肅赤色分分”在內）五千五百五十五人作為回答。資本家的這個挑戰，引起了歷時四個月之久的大規模的爭議。從此工人鬥爭的浪潮擴大到大化學產業工会、全日本印刷出版工会、全日本電綫工業

工会、全日本通運工会、私營鉄道工会總联合会、全日本港灣工会以及其他部門的各個工会，並發展成爲以全日本金屬產業工会協議会和全日本汽車產業工会爲中心的六月三日“保衛產業總奮起大会”（“日本勞動年鑑”第二十四集）。

這些爭議是工人爭取年終津貼、要求提高工資和反對解僱的經濟鬥爭。但工人或多或少已開始認識到他們的生活之所以遭受破壞，是因爲國際帝國主義和它的附庸吉田內閣執行了產業軍事化、殖民地化政策所致。因此，工人們在鬥爭中廣泛地進行了要求民族獨立、反對產業軍事化和保衛和平的宣傳。在全國金屬產業工会所領導的“日鉄”和“日立”的大規模的爭議中，這一點表現得特別明顯。其中例如等於是美軍直接管理工廠的池貝汽車廠所進行的爭議，就是爲了反對廠方執行美軍總司令部馬南中校解僱共產黨員和工会活動分子的命令。他們自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二日起，進行了五天的英勇的羣衆性的鬥爭，終於迫使廠方撤銷了這個命令。又如日本鋼鐵武藏野工廠，自一九五〇年一月中旬成了美軍直接管理工廠——勝利汽車工廠的加工工廠，從生產農具改爲生產登陸艇。於是工人們對於廠方成爲在美軍直接管理工廠的監視下提出了抗議，並進行了怠工；同時還散發傳單說：“我們知道是誰在變日本爲殖民地，是誰在遲發我們的工資”，“別叫我們先製造軍火，讓我們先製造和平的農具吧！”。

於是，儘管在美軍總司令部積極進行分裂活動和民主化同盟幹部也與之相呼应的情況下，但第二十一屆五一勞動節仍和往年一樣，在東京爭取實現五一節的統一行動——其他地方由於美軍總司令部的干涉，有些未能取得統一行動——有五十萬人高舉和平、獨立的標語牌參加遊行。這一天，日本全國有數百萬人被動員了，這是戰後最大規模的五一勞動節。保證最低生活水平的工資，排除殖民地的頹廢的文化教育，反對報紙、廣播

進行挑撥戰爭的宣傳，停止軍需生產發展和平工業，反對戰爭，反對變日本為軍事基地，堅決反對製造並使用原子彈和氫彈，履行基於波茨坦公告的全面媾和等口號響徹了日本全國。

二 農民的活動

在農民戰綫方面，日本農民協會自分裂後不僅迄未統一，而且分裂的程度是更加嚴重了。農民組織中的左右兩派都變得十分無力。因此，如與上述農民的窮困和農業危機的深刻化相比較，一般來講，農民的鬥爭自然是相對地低落了。只是在有好的領導的地方，則從一九五〇年開始才屢次與“勞動攻勢”相配合，或與同一地區的勞動攻勢共同合作，展開了值得注目的農民鬥爭。

從個別的來看，農民鬥爭的規模是比較小的，根據地方的情況，所提出的要求也各有不同；但從整個看來，一九五〇年四月日本共產黨的農民鬥爭的領導者曾對它作了如下的論述。“自一九五〇年以來，農民運動的面貌已經有了變化。在一九四九年秋天至年底的這段時間內，一向為鄉村惡霸勢力所操縱的請願運動，已在反對徵購、米價、農業合作社問題和停止執行土地政策等問題上有了廣泛的開展。特別是進入一九五〇年以後，農民鬥爭擺脫了惡霸勢力的操縱，一開始就展開了以爭取糧食為中心的保證貧農生活的鬥爭。三月至四月之間，曾有二、三千名羣衆進行了包括這些要求在內的反對徵稅鬥爭，並立刻將鬥爭擴大到了全國範圍。電氣產業工會、金屬產業工會以及鄉鎮工廠的工人也參加了這個鬥爭，農民、市民和中小商業者舉行了郡、市民大會和縣民大會，並向稅務署、地方事務所、市政府等處進行了遊行示威。有的地方遊行示威的隊伍還和警察發生過衝突。參加這些鬥爭的工人階級起了很大作用。現在農民鬥爭的特徵是它不僅提出了過去的關於經營方面的要求，而且將鬥爭

轉變為‘保證吃得飽飯’的鬥爭。因此，參加鬥爭的範圍也是廣泛而又多樣的，參加的階層有失業者，木工，泥工，貧農以至中、富農層，鄉村小商人，碾米所工人等。於是鄉村各階層根據各自的要求而進行鬥爭的農民鬥爭，由反徵稅鬥爭而統一起來，並與附近鄉鎮或都市的運動相結合，表現了向地域鬥爭方向發展的趨勢”。（松本三益：“農民運動的新形勢與發展的因素”，載“前衛”雜誌第四十九號）

三 市民鬥爭的展開

為了要求和平與民族獨立，不僅有組織的工人，而且連有良心的知識分子和市民也都曾反對美國統治集團及吉田內閣所策劃的單獨“媾和”和給美國提供軍事基地。一九五〇年一月，“和平問題談話會”（一九四九年秋成立）中的著名學者們（其中包括第一屆吉田內閣文部大臣安倍能成在內），公開發表了實現全面媾和、反對給任何國家提供軍事基地以及不容侵犯中立的要求；此後，許多學術團體和學者組織也發表了擁護和平的聲明。一九五〇年四月底，連日本學術界的官方最高機關所組織的日本學術會議第六屆總會，也由於民主會員的奮鬥而表明態度說：“我們決心今後絕不從事以戰爭為目的的科學研究”。於是，與世界和平運動相聯系的、日本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爭取和平運動就從這時展開了。這便是響應“斯德哥爾摩宣言”的簽名運動。這個運動是以工會為核心而進行的，截至一九五〇年底止，已徵集了六百萬以上的簽名。該宣言把重點集中在禁止使用原子武器的要求上，使得任何人都很容易理解，所以它首先在動員千百万羣衆參加和平運動的第一步上獲得了很大的成功。

和平與獨立也是學生的強烈要求。一九五〇年五月二日，美軍總司令部教育顧問意爾斯在東北大學正預備作講演時，學生知道了他的講演內容是宣傳反蘇、反共並以此為藉口欲使日

本教育殖民地化和壓迫學術研究的自由，於是齊聲反對，終於迫使意爾斯中止了講演。從此以後，以全國學生自治會總聯合會為中心的“反對帝國主義”、爭取“和平”和“學術自由”的鬥爭，以空前的速度在全國學生間擴展起來了。

此外，在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一日所舉行的國際學聯反對殖民制度鬥爭日日本中央大會，通過了團結一切青年爭取和平、獨立、自由，實現全面媾和，反對軍事基地化，反對給青年以低工資以及為打倒吉田內閣而組成“青年祖國戰綫”的決議，積極地開始了活動。截至一九五〇年八月十五日止，所徵集의斯德哥爾摩宣言簽名者約達七十五萬人。

日本婦女的和平運動也有了廣泛的發展。在一九五〇年三月八日的國際婦女節，日本民主婦女協議會、婦女民主俱樂部、新日本婦女同盟以及其他婦女團體的代表，還有工會婦女部、共產黨婦女部、社會黨婦女部等的代表共一萬名，聚集在東京日比谷公園舉行大會，以“反對戰爭和貧困”的口號為中心，通過了“遵守波茨坦公告、實現全面媾和”、“不要製造軍火”等決議。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美國對日“媾和”特使杜勒斯親自接到了甘特烈特恒子、神代田野、平塚雷鳥、野上彌生子和植村環五位日本婦女運動前輩所發起的“日本婦女關於和平的希望事項”，這表明了日本全國婦女不顧思想、信仰和政黨等立場的不同，一致在要求和平。希望事項中強烈地主張擁護和平憲法、要求絕對中立、全面媾和、反對提供軍事基地以及“拒絕把丈夫和兒子送到戰場”等。

對於日本各界的這些決議和聲明，一般報紙和無線電幾乎沒有作過報道。它僅通過各民主團體的機關報、雜誌、傳單或小冊子告訴了國民，只靠這些決議和聲明是不能夠迅速地組織數百萬羣衆採取行動的，這便是它的弱點。然而它的意義是絕不能忽視的。它將來會以某種形式為羣衆開闢採取行動的道路。

日本各階層國民以上述各種方式來表明爭取和平的意志，這是日本歷史上未曾有過的。

四 政黨的重新改組

一方面是殖民地化和軍事基地化的推進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恐慌的尖銳化，另一方面則是人民大眾對它所進行的反抗，為保障生活，要求全面媾和以及爭取和平、民族獨立運動的高漲，這些情況必然在國會或各個政黨中也引起了各色各樣的反映。一九五〇年初期的特徵就在於日本所有政黨都進行了重新改組。

社會黨在一九五〇年一月第五次大會上終於宣告分裂了。竭力打着階級政黨招牌的左派——但它們也經常強調反共——與主張以“國民政黨”即公開地主張以資產階級政黨出面的右派終於因爭奪黨內領導權而宣告分裂。各報紙視社會黨的分裂為社會黨幹部私人的權利之爭，自然，這也是重要因素之一，但這並不是唯一的原因。社會黨的分裂是因為：左派執心如果社會黨再不稍為表現一點“社會主義的”“階級的”立場；就無法吸引羣衆；右派則亟欲早日與資產階級各政黨聯合以便參與政權。然而左右兩派在一九五〇年四月又合併了。這是因為以分裂狀態來參加參議院選舉，對於左右兩派的黨魁以及它們的主子是不利的。一九四九年九月曾因積極響應勞農黨提出的共同鬥爭而被開除的足立梅市與和田敏明等人，對這樣的社會黨極感不滿，於是他們與其所領導的縣級幹部以及其他同志於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日成立了社會黨重建籌備會。他們決定以“保衛民族的完全獨立和自由，反對戰爭，維護和平”，“與勞農黨、共產黨合作，以此為中心來進行組織民族民主統一戰綫”為方針，並向社會黨內部有良心的人們發出呼籲。

日益高漲的民族意識在反動勢力所控制的國會中也有若干反映。如前所述，第六屆臨時國會未通過“食確法”；一九五〇年

三月，第七屆國會強烈地反對了道奇所編製的預算案。衆議院因執政黨民主自由黨佔絕對多數，勉強通過了該預算案，但在參議院就遭遇了重重困難。恰好這年五月是參議院半數議員的改選時期，因此，在野黨自可不必說，就是民主自由黨議員也爲了使自己在選舉中處於有利地位，不得不稍爲僞裝一下採納人民大眾要求的姿態。因此，一九五一年度預算案在進入新年度的四月一日仍未被通過；一九五〇年四月二日，參議院預算委員會，以二十三票對十二票否決了道奇預算案。本來一般認爲該預算案在參議院全體會議中也是難於通過的，但因美軍總司令部與日本政府施以壓力，在一九五〇年四月四日，才以一〇四票對九十五票勉強通過了。這就造成了史無前例的三天間的“財政空白”時期。參議院繼而否決了地方稅法案——這是把全部地方稅約增加到三倍，盡量使地方多負擔文化和社会經費，以便盡量用國家財政來充裕軍事警察費的法案——使它不能成立而告結束。這個法案也是美軍總司令部亟欲通過的，民政局長惠特尼曾於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九日，對參衆兩院議長發出強硬通告說：“不同意對該案作任何修改”，然而參議院地方行政委員會却否決了該案，參議院全體會議亦於一九五〇年五月一日，懼於當天五一節示威遊行的五十萬工人要求和平、獨立和自由的呼聲的壓迫，終以一百零二票對七十三票的多數否決了該案，這是日本國會居然拒絕了佔領當局要求的最初例子。

在國會進行這些活動的過程中，一九四九年秋天又出現了“保守政黨大聯合”的活動。吉田和民主自由黨幹事長廣川表面上說：這是爲了準備“和會”以期政局的長期穩定；其實，這是爲了更徹底地強制實行以國內外壟斷資本爲本位的政策，壓制國民的力量，將民主黨和國民協同黨也合併起來置於吉田的獨裁之下，以期實現資產階級地主官僚的統一戰綫。然而，這個方針首先在民主自由黨內部遭到大野伴睦一派的反對——大野是被

整肅的鳩山的黨羽，他不希望吉田的勢力由於保守政黨的聯合而增強——同時，被號召“聯合”起來的民主黨和國民協同黨的骨幹也反對“聯合”。因為它們對民主自由黨獨裁的前途沒有信心，又因為它們的後台的中小企業或與美國壟斷資本主義並無勾結的一些大資本家，受到吉田買辦政策的摧殘，所以增長了反吉田、反民主自由黨的情緒。於是，吉田等所指望的“保守政黨大聯合”，最後只是在一九五〇年二月十日從民主黨的“聯立派”^①拉出二十三名衆議院議員和五名參議院議員入民主自由黨，並從一九五〇年三月一日起將民主自由黨改名為自由黨。

另一方面，沒有響應保守政黨大聯合的民主黨在野黨派，拉攏國民協同黨，於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二日召開黨大會並聲稱其目的在於“力求統一進步的國民勢力”，於是在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八日，以民主黨、國民協同黨兩黨為核心，並吸收小黨派的數名議員參加，成立了“國民民主黨”。這個玩弄所謂溶合了中庸主義、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優點的煽動性空話的國民民主黨，只是一個不滿意吉田自由黨的大中資產階級和地主富農的黨，其中成分複雜，包括着多少具有民族資本家色彩的、法西斯分子的以及其他各色各樣的成分在內。

五 共產黨情報局對日本共產黨的批判

雖然與資產階級各政黨以及社會黨的分裂或聯合有本質上的不同，但在民族危機再度加深的漩渦中，共產黨也不得不起一大變化。日本共產黨儘管還有不夠的地方，然而它曾把日本的民族危機及時地告訴人民，一九四八年四月它提倡組織民族民主統一戰綫，從此，民族鬥爭的意義才逐漸地廣泛而深刻地取得

^① 民主黨內當時分為“聯立派”和“在野黨派”，聯立派一直是贊成與吉田合作的。——譯者

了國民的理解。一九四九年九月共產黨首先預計到形勢的發展，號召為反對單獨“媾和”與軍事基地、立刻締結全面和約以及媾和後撤退一切佔領軍隊而進行鬥爭，於是上述的爭取獨立與和平的羣衆運動才有了發展。然而，共產黨當時却未曾對國民大衆明確指出佔領軍的性質，黨的最高領導人之一野坂參三甚至發表了即使處於佔領制度下亦可經由和平方式建立人民政府之類的演說和文章。縱令這是矇混敵人眼界的一種偽裝，但當時的客觀形勢已使這種理論有了發展，它只能給國民以錯誤思想，不僅絕不可能引導國民擺脫民族危機和保衛世界和平，而且會帶來極大害處。因此，必須迅速糾正這種“理論”，指出爭取獨立與和平的正確道路。一九五〇年一月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機關刊物“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對此作了嚴厲的批評。該刊稱：

“在美國帝國主義對中國和朝鮮的掠奪計劃失敗之後，美國國務院和美國軍國主義者就集中其主要注意力於日本，作為反對蘇聯和反對亞洲各國民主運動的軍事冒險的主要基地。首先，他們企圖用種種無稽的藉口來拖延對日和約的簽訂，並且用這種辦法來使美軍對日長期佔領合法化。”“美國侵略者支配着日本政治經濟。”日本在美國帝國主義的“統一支配之下”，日本產業在美國控制下趨於軍事化，日本全國也美國軍事基地化了。麥克阿瑟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二日，對倫敦新聞特派記者公然宣稱：“我已經在沖繩島修築二十五個飛機場，這些飛機場保證我們超級重型轟炸機每天進行三千五百次飛行……太平洋現在是盎格魯·薩克遜湖。”“日本資本家並沒有落後”，國家財政預算就是純為照顧它們的利益而編制的。

“恢復軍國主義日本以及鎮壓民主運動早就是日本反動派與美國帝國主義者集團的共同目標和基礎。除了這種共同目標之外，這個集團的每個參與者還在試圖實現各自的計劃。日本

反動派是在利用在日本有利害關係的美國資本家作為同盟者，靠他們來支持日本反動派在日本的政治影響；而美國帝國主義則利用日本反動派作為一種工具，有了這種工具，就更易於摧殘日本的民主團體與建立對日本的完全的政治與經濟的統治，就更易於使日本變成軍事冒險的基地以及使日本人民成為砲灰（中略）。

“共產黨組織、工會和日本一切民主力量應該將勞動人民團結起來，天天不斷地揭露外國帝國主義者在日本的殖民地化計劃以及日本反動派的賣國和反人民作用。它們應該為日本的獨立，為建立一個民主愛好和平的日本，為立即締結公平的对日和約，為從速撤退駐日美國軍隊，為保證各國人民間持久和平而進行堅決的鬥爭（中略）。但是，事實說明，日本共產黨某些領袖的言論並不在於成功地執行這些重要的任務（中略）。例如，日本共產黨領導人物之一野坂在分析日本國外國內政治形勢時曾力圖證明：戰後的日本具備着和平轉變到社會主義的一切必要條件，即使處在佔領制度的條件之下；他還進而硬說：這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在日本國土上的本地化。’”^①

如此，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的觀察家徹底地批判了野坂對於佔領軍的錯誤認識以及人民可經由國會獲取政權的錯誤理論。

接着上述批評，中國共產黨也發表了批評。日本共產黨自一九五〇年一月十八日開始繼續三天舉行了第十八次中央委員會擴大會議，全體一致接受“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批評的積極意義”，並按照這個路線決定了新政策。野坂自己於一九五〇年二月六日亦發表了自我批評。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的批評不僅引起了日本共產黨深刻的自我批評，而且給廣泛的人民大

① “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一九五〇年一月六日，——譯者

衆——甚至包括熱心的反共主義者在內——指明了民族的敵人並喚起了民族意識。麥克阿瑟早已看出了這種情況，一九五〇年五月三日，他在日本新憲法實施三週年時暗示將使共產黨非法化。他說：“過去有人以爲日本共產主義在國內運動上，較其他國家的共產主義運動可能保持較爲溫和的路綫，但是，現在日本共產黨公開屈服於國外的干涉……，它已成爲違反日本利益的黨，並採取了不利於日本國民的運動方針，根據這個事實，顯然上述認識是完全錯誤的”，因此，可以考慮把它置於法律的保護之外。這說明麥克阿瑟是如何地害怕清算了野坂“理論”後的日本共產黨的影響力量。

六 戰爭前夕的鎮壓

儘管如此，一九五〇年五月三十日，爲了紀念在一年前的這一天因參加反對公安條例遊行而被殺害了的東京都電車公司工人橋本金二，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在“人民廣場”召開了爭取全面媾和的人民總奮起大會，約二萬工人參加了這個大會。

十二點半鐘的時候，大西兼治等五、六個工人走近正在會場記錄到會者的演說的丸之內警察署的巡警須藤，對他說：警察的這種特務行爲是違反遠東委員會關於日本工會運動的十六項原則的，要求須藤停止記錄並由須藤交出記錄紙。正在這個時候，美軍“反間諜情報機關”柯恩中士跑來向大西說：爲什麼“奪取”記錄紙（引號內的字是檢察官所說的），當他追問理由和姓名地址的時候，“八個”工人把柯恩中士“摔倒了”，接着把前來援助的美籍日人山下下士和山本中士“推倒在地上毆打”。會後遊行隊伍正走到日比谷公園，美軍士兵爲拘捕上述“暴行”事件犯人，衝入工人隊伍拘押嫌疑分子，並帶走了當時進行反抗的日本人；當天傍晚，又在丸之內警察署附近拘捕了兩個人。橫遭拘捕的這八個工人被付諸美軍軍事審判，罪名是“以共同意志採取共同行

動，故意且非法抗拒佔領軍的公務命令”，“以共同意志採取共同行動，故意且非法對佔領軍人施以暴行”。這個審判僅花費四十小時就宣告結束了，判決結果，大西被處以苦役十年，其他六人被處以苦役七年，一人被處以重役五年。

這次事件的第一個關鍵問題在於大西是否“奪取”了須藤巡警的記錄紙，須藤巡警說是大西奪過去的，而大西說是須藤交給他的。記錄紙並沒有撕破，據巡警作証說：它沒有撕破是因為“大家圍上來脅迫他交出去的”。當大西跟須藤要記錄紙時，須藤也許感到被“脅迫”而不得不交出來，即使這是事實，這也絕不能算是行使暴力，而只是口頭交涉。當時因為美軍“反間諜情報機關”的軍人走上來，所以許多日本工人也跑來問“是什麼事情”，於是說是發生了“暴行”，但是，所謂遭受“暴行”的軍人却連一點傷處也沒有。即使說曾遭受“暴行”，但也毫無証據可以證明加害者就是被告們。檢察官當做証據的照片，雖然模樣有點像被告，但從這個像片中却顯示出來他並未從事“暴行”，相反地，這是與“暴行”毫無關係的。辯護律師們曾經明快地指出：不僅毫無証據可以證明八名被告曾有“出於共同行為的暴行”和“出於共同意志的暴行”，而且既不可能有這種事實，也並沒有發生過這種事實。然而審判長却完全置之不顧。關於這次裁判的詳細速記，載於“報告”雜誌第五十二號中。

這次審判是匆匆忙忙地在六月三日宣佈了上述的判決，這一天正是參議院選舉投票的前夕，也就是預定舉行“突破產業危機人民大會”的那一天。於是日本全國的報紙和廣播都大肆宣傳“對佔領軍施以暴行者”被處刑的消息，並極力譏諷具有戰鬥性的工會和共產黨。政府、自由黨和進步黨自不必說，連社會黨以及自命並被公認為所謂“有識之士”和“進步人士”者，居然也責難共產黨終於對佔領軍行使暴力。即使日本的報紙和廣播沒有力量要求公平的裁判，但為什麼不根據在法庭所提出的事實

作公正而客觀的報道呢？是沒有這種自由呢，還是有其他特殊原因呢？不久的將來，歷史將判決誰是暴行者，誰是和平捍衛者。

五月三十日事件成爲進一步大規模地鎮壓的藉口和預兆。以全國金屬產業工會和全日本汽車產業工會爲中心，預定六月三日在全國舉行“突破產業危機人民大會”，而全日本金屬產業工會（十三萬人）、全日本汽車產業工會（四萬五千人）、大化學產業工會（三萬五千人）和日立總聯合會（三萬三千人）各工會亦已正式指令所屬工會舉行罷工並參加此次大會。全日本造船工會所屬的長崎造船所一萬工人按照預定計劃自六月二日至五日舉行了罷工。預計京都、橫濱和北九州等重工業地區將要展開罷工的浪潮。瘋狂的日本政府於六月二日下午八時，突然宣佈自三日至五日之間禁止在東京舉行一切集會和遊行，並於六月三日動員東京都內七十三處警察署和全部消防隊準備採取行動。在他們的心目中是既沒有憲法又沒有任何法律的。日本各地爲反抗這種橫暴的壓迫都舉行了罷工。

一九五〇年六月四日的參議院選舉等於是在首都戒嚴中進行投票的。值得記住的是，這種選舉就是美國式的民主主義和“自由國家”的選舉。選舉結果，當選者爲自由黨五十二名，社會黨三十六名，民主黨九名，共產黨及其所推薦者七名，綠風會九名，其他十九名。自由黨在這次選舉中力圖使六十至八十人當選，曾供給每個候選人以一千萬日元至二千萬日元的選舉費，採取了收買以及其他一切不法手段，然而，儘管如此也只有五十二名當選，得票數也比上屆衆議院選舉時減少了一百萬票。民主黨也同樣地減少了一百萬票，這些票流入了社會黨、綠風會以及其他無黨派人士之手。共產黨及其所推薦的候選人的得票總數爲二百八十八萬餘票，較上屆衆議院選舉得票數約減少了十萬票。這次選舉是在事實上的戒嚴中舉行的，而共產黨所得票數

之所以能与上届选举中一舉当选三十六名議員時沒有多大差別，就表明渴望和平与独立的羣衆並沒有屈服於官方的鎮压，同時也表明共產党的潛在力量。

麥克阿瑟曾於一九五〇年五月三日發表聲明說：“共產党已被‘粉碎’，只有極少的殘餘分子还在蠢動而已”。但是，大概他看到他的聲明以及五月三十日事件和六月三日事件的鎮压，都對於選舉未曾起什麼作用，所以於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指令吉田政府解散日共中央委員會以及“整肅”日共全体中央委員。次日，日本共產党機關報“赤旗報”的編輯幹部等十七名也被整肅了。原來是整肅軍國主義者和法西斯主義者的法令——“褫奪公職令”，現已成為維持法西斯統治的武器。於是在日本全國各地，以有組織的工人為主舉行了反对暴力鎮压的抗議罷工和集會。这使得日本政府不禁惴惴自危。於是，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三日，政府要求法院對三鷹事件被告判刑（三名判處死刑），藉以恫嚇人民，從六月十六日開始，更無限期地禁止了全國一切集會和遊行。這種橫暴的壓迫毫無任何法律和政令條例的根據。只是由國家警察本部長官命令全國的各警察隊長，由東京“警視總監”以地方自治單位警察聯合會會長的身分與全國地方自治警察採取“联系”後加以執行的。中央集權的警察由於“警察民主化”的結果，按理說已應該不存在了，然而事實上確是如此。對於這種情況，報紙和廣播不僅不曾提出任何抗議，甚至也未曾作過正確的分析。歷史證明，對共產党的鎮压意味着立刻就將剝奪全國人民的自由，同時也意味着戰爭即將到來。這個歷史的公式是很符合於事實的。